

从中国古代反智与主智的思潮交织 看集权与分权的博弈发展

何佳彧
中南大学

摘要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思潮现象，以法家为代表的反智主义在封建王权运作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对士人阶层的思想控制与对平民百姓的舆论约束。而与此相对，以传统孔孟儒学为范例的主智思潮则尊重知识分子，主张积极运用智性，崇尚知识。这两种思潮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长期交织存在，相互影响，并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变迁紧密相连。本文基于余英时所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深入剖析了反智与主智思潮在政治、思想、社会舆论等领域中的体现，以及其与封建社会集权进程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在中国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变迁中，反智的传统与权力的集中往往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面貌。通过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探讨，本文旨在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关键词 反智主义 中央集权 余英时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60404>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4.0603.41-49

收文记录 收文：2024年6月10日；修改：2024年7月16日；发表：2024年8月31日。

引用本文 何佳彧. 从中国古代反智与主智的思潮交织看集权与分权的博弈发展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4, 6(4):41-49. <https://doi.org/10.6914/tpss.060404>.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第6卷第4期, 2024年8月31日出版, <https://ssci.cc>, 电子信箱:wtocom@gmail.com.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woven Trends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Pro-Intellectualism in Ancient China

Jiayu H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long-standing ideological trend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ti-intellectualism, represented by the Legalist school, manifested in the control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nd the restraint of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feudal monarchic power. In contrast, the pro-intellectualism trend, exemplified by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respected intellectuals, advocated the active use of intellect, and esteemed knowledge. These two ideological trends coexisted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over a long period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practic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s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Yu Ying-shih's book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pro-intellectualism in politics, thought, and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their intrinsic logic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cess of centralization in feudal society. In the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feudal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the tradition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often formed a causal relationship, together constituting the complex landscape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historical patter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ancient China.

Keywords Anti-Intellectualism, Centralized Power, Yu Ying-shih

Cite This Article Jiayu HE (2024).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woven Trends of Anti-Intellectualism and Pro-Intellectualism in Ancient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6(4):41-49. <https://doi.org/10.6914/tpss.060404>

© 2024 The Author(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Volume 6 Issue 4, published on 31 August 2024,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https://ssci.cc>, <https://cpcl.cc>, E-mail: wtocon@gmail.com, kycbshk@gmail.com.

引言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于 1962 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其意为一种怀疑、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体现了一部分具有反传统、反文化意识的人们对精英掌控社会话语权的不满与反抗。^[1] 而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后文均简称为《诠释》)中，作者余英时也就“反智主义”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体现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他认为反智论往往表现为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采取一种轻视以至敌视的态度，以知识分子为攻击对象。^[2] 与此同时，余英时也提出了与“反智”相对立的“主智”概念——即尊重知识分子，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崇尚知识的态度。他指出，古代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且其“反智”特性的表达可以说是与“主智”的风气并举存在的。^[3]

如余英时所言，“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说，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¹ 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进程中，反智与尊智的思潮长期交织存在，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古代政治变迁中亦呈现出一项明显的对立趋势，即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博弈亦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展开。反智的传统并非孤立的存在，当我们将其与封建社会的集权进程相联系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在中国逾两千年封建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反智的传统与权力的集中往往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并在政治、思想、社会舆论等诸多领域得以体现。

一、政治上的权力集中：君主集权与官僚分权的抗衡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君主集权专制政治模式，君主是专制国家统治阶级的代表，在以人治为突出特征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无疑处在核心与枢纽地位。^[4] 而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复杂纠葛及其动态变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篇章，更是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结构与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这一对立冲突与力量消长的过程，体现了古代帝王与辅臣之间微妙的权力博弈，也映射出封建社会权力结构的内在逻辑与演变规律，也历来为诸多学者所探讨研究。

在《诠释》一书中，余英时指出，相权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辅助与制约君权的角色，但其根本属性决定了它无法成为与君权等量齐观的独立力量。相权的存在，实际上是君权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国家、实现政治目标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其权力源泉直接源自皇帝的信任与授权。因此，相权的强弱变化往往随着君主的意志与统治策略的调整而波动，难以形成对君权的稳定制衡。而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君权的，并非相权

¹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第一版第 46 页

本身，而是更为广泛而深厚的“传统的官僚制度”。这一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且复杂的运行机制，使得官僚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君主的个人意志，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宰相作为“百官之长”“群僚之首”，不仅因其地位特殊而具有象征意义，更因其能够代表整个官僚群体发声，从而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官僚制度对抗君权过度扩张的先锋。“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袖，因此当官僚制度对任意挥洒的君权发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时，相权往往首当其冲。”²

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历程，实则也是封建君主权力逐步强化集中的集权之路。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的萌芽很早在奴隶社会时期——春秋时期即已初露端倪。^[5]中国的宰相的官方正式设立自秦朝李斯始，至明朝朱元璋诛杀胡惟庸从而废除丞相一职终，相位的彻底废除也象征着皇权的逐步强化与不受质疑。君权强化的传统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其倡导“尊君”，主张君主通过严刑峻法的手段强化对国家的控制，并施行愚民的政策从而最大程度弱化百姓的反抗意识。在法家的传统理论中，反智主义倾向显著，而基于这一观察，我们同样能够推断出其衍生的“集权”手段亦为一种具有反智色彩的政治行为。君主绝对权威的树立需要消灭那些与其相冲突的声音，而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自是最具有威胁的群体——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6]他们往往饱读诗书又能言善辩，接受了充分的教育从而具有自己的想法，而传统道德亦倡导读书人“直言善谏”的勇气，在某一个体名望极高或者聚集而形成了团体时威胁往往更大。在君主的心中，知识分子最不可爱的性格之一便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线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时还要提出种种疑问和批评。³因此对知识分子群体控制与打压也随之成为了需要巩固自身权力的统治者的必行手段，秦朝的焚书坑儒及宋代的乌台诗案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反智”的政治传统由此形成。

与此同时，“反智”也绝非古代传统政治中的全部，“主智”的风尚在封建社会也依旧与反智主义共同存在，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交织进行。不可否认，法家对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历程，所占据主流地位且被官方推崇认可的学说依旧是儒学。儒家推崇“礼乐”、“教化”，从而与对知识的渴求与汲取紧密相连。儒家在政治领域对智性的重视，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论政的议题上展现得尤为鲜明与具体。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方面倡导知识分子应当秉持原则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强调当政者需时刻留意并选拔贤能之士，在其政治观念体系中，智性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确立下儒学的官方地位，也从而奠定了传统价值观中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从这一视角而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主智”的成分无疑是存在且夺目的，这种“惟有读书高”的观念

²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第81页

³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第63页

激励着无数学子立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渴望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功名，最终也推动了传统政治场域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的形成，即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官僚团体。在“主智”价值导向的影响之下，该群体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能力，在成为封建君主不可割舍的治国助力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传统形成的道德约束和官方钦定的程序制度，对王权起着约束和分散的作用。

封建君主对官僚群体既“需要”又“压制”的态度是传统政治场域“反智”与“主智”思潮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官僚体系是国家政策实施、地方事务管理以及社会秩序维护的基石。若缺乏一支高效且忠诚的官僚队伍，国家的正常运作将面临严重阻碍。鉴于此，君主必须依赖官僚群体作为协助力量，共同治理国家，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而传统的道德观念也要求着一位“明君”务必选贤举能，善待知识分子群体。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史官制度也对于大多数皇帝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确保他们在缺乏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时，不得随意对臣子施加惩罚。在此同时，君主们亦对官僚群体持有“畏惧”之心。他们深切忧虑官员权力过度膨胀，进而可能动摇其统治的根基。某些官僚在长期从政的历程中，会逐渐累积起显著的威望与影响力，这些潜在的能量有可能削弱君主的权威，甚至对其统治地位构成直接威胁。历史上，因官僚权力过度集中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与动荡屡见不鲜，这些历史教训使得封建君主对官僚群体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防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中集权与分权、反智与主智的动态平衡，反映了君主与官僚体间的权力博弈和思想交锋。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并非单一的“反智”所主导，“主智”思潮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政治文明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封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对官僚群体既表现出依赖，又持有警惕之心，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反智”与“主智”两种思潮在传统政治领域内的长期并存与相互制衡。这种复杂的权力结构，铸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独特风貌。

二、思想上的意识统一：百家争鸣到焚书坑儒的变迁

除去最具体的政治场域，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反智”与“主智”的思潮交织发展现象也同样显著。思想与政治向来是彼此反映与相互影响的，如同政治统治模式最终趋向于集权强化的发展规律，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趋势也是逐渐由自由散漫走向受控统一，王权控制的强化离不开对思想统一的要求，“反智”与“主智”的对立与共存也交织贯穿其中。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无疑是一段智性光芒璀璨绽放、思想活力空前高涨的历史时期，它不仅是社会秩序重构与文化创新的关键节点，更是无限接近于人们理想中“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一直为后世所憧憬赞扬，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一批超越时代局限、独具慧眼的思想巨擘。“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特有的性

格，是他不把自己等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他可以代表不同的阶级说话”⁴这种超脱于阶级束缚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正是春秋时期思想繁荣的精髓所在，他们就不同的站位提出了视角迥异的理论，却无一不成为后世思想发展的源泉之一，影响深远而持续。齐国所创办的稷下学宫可谓是那个时期思想表达和交流自由的最好缩影，云集在此处的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百家争鸣”的现象之所以能在春秋也只能在春秋时期得到实现，其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宽松的文化氛围。随着周朝王权的日渐式微，以及古代贵族制度的瓦解，学术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王官垄断逐步转移到私人手中，通过私人讲学和游学，又把王官学术带到民间来，便是所谓的百家之学之始。在此期间，多国诸侯相继崭露头角，构建了一个多元且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这种分裂与动荡的局势，为各类思想流派提供了自由传播与发展的沃土。士阶层的崛起成为学术繁荣的重要人才支撑，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理论和主张。私学的兴起进一步为学术的自由交流搭建了平台，不同学派之间得以进行深入的辩论与探讨。至此，百家争鸣、学派竞艳，各种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主智”的思潮在此得到了空前的绽放，中国古代思想史因此得以留下了丰富且珍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这种思想自由、智性的最大程度发展注定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就如上部分所言，春秋战国由秦统一六国为终，伴随着国家一统，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顺服、思想统一的要求愈发凸显，君主凭其权威来规定教育、训导、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使其达到预期的目的。^[7]百家争鸣的“主智”活跃也至此中止，反之转向如同“焚书坑儒”一般“反智”的诸多思想专制手腕的施行。在后续封建王朝的历史演进中，尽管其具体实施手段与形式各异，但思想控制依旧始终被视为巩固皇权的关键策略之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无疑为儒家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容忽视其对其他思想流派的制约与限制。及至唐宋，科举制度的推行，为士人阶层开辟了一条通往仕途的明确道路，然而，这也相应地导致了他们的思想活动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框定和局限。在明清两朝，此类反智的倾向发展至极致。明朝所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其框架严谨而单一，极大程度地束缚了士人的思考方式和表达空间，导致其思维僵化，难以展现创新之精神。而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言论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压制与迫害手段，使得众多才华横溢的士人被迫选择沉默，甚至逃离社会，以避免祸患。至此，封建王权的思想控制力度以及反智思潮的活动度达到顶峰。

但哪怕思想控制却以成为统一王朝的“反智”发展主流，有着“主智”意识的个体或者人群的抗争依旧存在于其中。明朝有王阳明倡导“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强调个体内心

⁴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第116页

的觉醒与自我完善，挑战了当时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又如清朝的顾炎武，他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强调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社会现实，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撰写了大量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著作，为后世的学术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封建王权盛行“反智”之风的背景下，这些“主智”的个体或群体犹如一股清新之流，为思想的自由与智性的繁荣注入了新的动力。尽管他们的抗争与不懈努力难以彻底撼动封建社会的思想控制架构，但他们的贡献无疑为后世的思想进步与社会变革贡献了独属于其的一份力量。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思想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一个深刻而又复杂的辩证关系：反智和主智的思潮交织于思想控制和思想自由的斗争中。尽管历史上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令人向往，但在政治统治模式集权强化的推动下，思想逐渐走向受控统一。智慧和自由永远值得坚守，反智和思想控制的存在值得警惕。正如余英时在《诠释》中指出，无论是于学界而言还是于现实生活而言，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自由的存有永远与规范的设立并行；“社会上有适当的自由，保存适量的 free floating resources 使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展，不只对中国文化有贡献，而且也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⁵人类思想史上所留存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及其在漫长岁月中所经历的坎坷警醒着世人，哪怕是在风气自由、崇尚民主的当代社会，也必须时刻警惕权力对思想的束缚，保护智慧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才是永葆人类思想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总结

综合政治权力结构与思想文化发展这两个关键场域的内在规律，足以深刻洞察到，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反智主义这一思想倾向往往与君主集权的强化以及思想统一政策的实施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封建社会对权力高度集中的需求之中。君主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倾向于通过限制思想自由、打压异见、推行官方意识形态等手段，来确保民众思想的统一与顺从。这种反智主义的实践，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却也遏制了思想的多元发展与创新活力。

与之相对，主智思潮的兴起则是对这种思想控制的一种反驳与回应。它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尊崇之上，通过赋予他们社会地位与话语权，鼓励他们勇于探索、敢于质疑，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思想的自由交流。同时，主智思潮还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多元化的思想表达与讨论，为社会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宽松的思想环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为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提供了思想基础。

反智与主智思潮的交织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博弈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⁵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第117页

和社会的复杂面貌。主智论与反智识主义的关系并非如磁石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体用”关系二者之间的斗争与融合，^[8]其不仅塑造了古代社会的思想格局，使得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并存、此消彼长的复杂态势；更在深层次上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轨迹与政治变革的走向。每当主智思潮占据上风时，社会往往能够迎来一段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期；而当反智主义盛行时，则可能导致社会思想僵化、创新受阻。

因此，在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时，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反智主义作为一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控制与压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抑制了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但也为封建君主权力的集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主智思潮则通过强调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反智倾向还是主智思潮，它们均是在特定历史时空的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思想产物，其形成与发展无不深刻地烙印着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化风尚的演变。这种复杂性意味着，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这两种思想现象，而是应当将其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量。就“反智”而言，其强调的思想统一，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可能被视为对个体思想自由的某种限制或压迫。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国家初创、民族融合或社会动荡时期，理念上的高度一致往往能够凝聚人心，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团结的力量，通过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目标，能够激发民众的集体行动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反观主智思潮，它倡导的自由交流与思想解放，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当这种自由与交流缺乏必要的引导与规范时，也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环境的过度无序，进而引发思想混乱、价值冲突乃至社会动荡。反智与主智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古代社会变迁中多元思想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复杂体现。我们应当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全面的视角，去审视这两种思想现象在古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对于后世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当今时代，历史规律依旧具有极为有益的启示作用。正如《诠释》中所提醒的，“传统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凭藉着传统中非理性的力量来从事现代化的变革，其结果只有使传统和现代越来越来距离越远。”⁶须秉持对知识的敬畏与对人才的尊重，充分认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同时，也需高度警惕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致力于防范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现象。思想本身觉悟非黑即白，其作用结果在于大众如何面对并对其加以领悟。合理平衡“反智”与“主智”两类思潮在当今社会的平衡关系，同时积极倡导并推动思想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以期

⁶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第95页

为社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编辑：赵伟男〕

作者简介 何佳彧，女，湖南省岳阳市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文化历史学。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韶山南路 68 号中南大学铁道校区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10000，Email: 2451389518@qq.com, <https://orcid.org/0009-0004-9267-5706>。

参考文献

- [1] 樊星. 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反智主义”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0 (03): 74-79.
- [2] 龚留柱. 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J]. 中原文化研究, 2013, 1(05): 32-39. DOI: <https://doi.org/10.16600/j.cnki.41-1426/c.2013.05.004>.
- [3]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 [4] 鞠智超. 中国传统君道思想研究 [D].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DOI: <https://doi.org/10.27212/d.cnki.glnsu.2022.000307>.
- [5] 战继发, 项瑛, 秦翠华. 我国封建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发展、演变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J]. 大庆社会科学, 1995, (02): 36-38.
- [6] 谷宇, 房政. 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 (02): 35-38. DOI: <https://doi.org/10.16273/j.cnki.53-1134/d.2007.02.008>.
- [7] 刘汉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和早期的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二 [J]. 广州师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03): 40-43+72.
- [8] 张瑞龙. 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 [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01): 35-41.